

研究儒法军事斗争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初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部翻印

一九七四年九月

目 录

- 一、研究“以礼治军”和“以法治军”的对立
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饲养员 赵少竹（1）
- 二、研究法家奖励“耕战”与儒家“去兵去食”
的对立批判林彪破坏人民武装反对全民皆兵
的罪行
.....战 士 郝 谦（8）
- 三、研究儒法两种战争观的对立批判林彪在战争
问题上的反动立场
.....副班长 张国占（16）
- 四、研究儒法抗战与投降两条路线的对立批判林
彪效法孔孟鼓吹“小国师大国”的反动谬论
.....司号员 张宪正（24）
- 五、研究儒法两家在战略战术原则上的对立批判
林彪在战略战术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给养员 朱心宽（31）
- 六、研究儒法在军事问题上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批
判林彪的唯心史观
.....战 士 张振富（40）
- 七、我们是怎样依靠战士举办儒法斗争史讲座的
.....北京部队某部重炮连党支部（47）

研究“以礼治军”和“以法治军” 的对立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饲养员 赵少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政治路线决定军事路线，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军事路线。儒法两家在围绕“克己复礼”还是“革新变法”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同时，在军事路线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研究儒法两条军事路线的对立，弄清林彪和孔孟反动军事思想的联系，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以及为之服务的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有着重大的意义。

“以礼治军”还是“以法治军”，这是儒法两条建军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斗争的实质是使军队为“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还是为“革新变法”的进步政治路线服务。

儒家主张“以礼治军”，就是把腐朽没落的奴隶制的“礼”和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向军队灌输奴隶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儒家的黑书《礼记》中就說：“治理军队如果不按周礼就失去了威严”。孔老二叫嚷：“军队进行训练时，有了周礼就能练得纯熟，打仗时有了周礼才能胜利。假如没有周礼，军队的训练和作战就没有保证。”①以后历代的反动儒家都拣起了孔老二的这个破烂，做为治军之道。宋朝的反动儒家司马光反对王

安石变法，叫嚣要“以礼治军”；②另一个反动儒生胡安国提出，“把‘三纲’作为治理军队的根本”。③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把“克己复礼”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要旨，每天读三次，“用兵执政时时不忘”。④独夫民贼蒋介石更是如此，公然主张要把孔老二鼓吹的“仁”作为《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⑤反动军阀宋哲元，把四书译成白话，印成精装袖珍本，发给官兵，人手一册，也是“以礼治军”的典型。

法家主张“以法治军”，就是把新兴地主阶级革新变法的政治路线作为建设军队的根本。商鞅提出要缘法而“治军事”，⑥使士兵懂得为实现革新变法的政治路线而战斗牺牲是光荣的。他反对孔老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⑦的反动说教，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合法的话不要听，不合法的行动不要表扬，不合法的事不要去做。以后历代的法家也都是主张“以法治军”的。韩非明确指出，要“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⑧就是要用法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军队教育的内容，废除奴隶主贵族的那些陈词滥调。刘邦在秦末起义率兵攻入咸阳、占领关中时，曾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规定：杀人的要偿命，伤人或抢人东西的要抵罪。这三章之法，当然也包括对军队的约束。三国时的曹操明确提出“治军以法”。他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礼不可治兵也”。⑨诸葛亮也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他在军中也是严格实行“法治”的。他认为：“孙（子）吴（起）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⑩他说：“如果赏罚不明，叫进攻不进攻，叫退却不退却，这样的军队即使是再多，也是无用的。”⑪有一个故事叫“孔明挥泪斩马谲”，就是诸葛亮“以法治军”的一例。公元226年（蜀建兴四年），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

与魏国作战，諸葛亮派馬謖帶兵鎮守街亭，馬謖沒有执行諸葛亮的作战部署命令，結果使街亭失守。諸葛亮被迫撤回汉中。馬謖是諸葛亮一手提拔起来的軍事將領，他还是按当时的軍法斬了馬謖。諸葛亮认为馬謖失街亭，自己也有責任，因此請求把自己的官职下降三級。

“以礼治軍”和“以法治軍”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儒家“以礼治軍”，目的在于把軍隊作为“兴灭国，继絕世，举逸民”的工具。战国时期郑国鎮压萑苻之泽的奴隶起义，秦始皇当政时呂不韦勾結嫪毐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西汉汉景帝时期发生的吳楚七国之乱等，都证明了儒家用兵的目的是搞复辟、倒退的。汉朝的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把这个问题說得清清楚楚。他說：“用兵的目的，就是要兴灭国，继絕世，拯救旧制度的灭亡，对‘犯上作乱’、反抗旧制度的人实行鎮压”。法家“以法治軍”，目的是使軍隊成为推翻奴隶主貴族統治，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反对諸侯割据，实现国家統一的工具。韓非曾經明确指出：只有用急风暴雨般的武力，才能推翻已有灭亡征兆的諸侯国君的反动統治，才能統一天下。他用树木虽然腐朽，沒有疾风自己不会断折；牆壁虽然破烂，沒有大雨自己不会倒塌，^⑫来深刻地說明反动腐朽的奴隶主貴族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必須用暴力来推翻它。韓非的这段话，也把法家“以法治軍”的政治目的說得清清楚楚了。

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賊林彪是混在我們党内的一个反动大儒生。他尊儒反法，在政治上，效法孔孟“克己复礼”，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妄图顛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資本主义；在軍事上，他效法儒家的“以礼治軍”，推行资产阶级軍事路綫，妄图把我軍变为他复辟資本主义的工具。林彪胡说什么：“我軍两条

路綫的斗爭，一條是突出軍事，一條是突出政治，我們要堅定地走突出政治的道路”。^⑬林彪這一反動謬論，不僅掩蓋了我軍兩條軍事路綫斗爭的實質，是堅持人民軍隊、人民戰爭還是破壞人民軍隊、反對人民戰爭；而且妄圖在突出政治的幌子下，用資產階級思想和孔孟之道腐蝕我軍的靈魂，也就是實現他“克己復禮”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政治。這同儒家的“以禮治軍”是一脈相承的。有林彪的反動言論為證：

一謂“先立乎其大者”。一九六〇年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不久，就叫嚷要“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⑭這句話是從孔老二的忠實門徒孟軻那里原封不動地抄來的。所謂“大者”，就是指的仁、義、禮、智、信一類的孔孟之道。林彪叫嚷要“先立乎其大者”，實際上是宣布他要“以禮治軍”，在我軍灌輸反動的孔孟思想，妄圖使我軍為他“克己復禮”、“唯此為大”的反革命野心服務。

二謂“都當董仲舒”。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大喊大叫“漢朝廢百家，獨尊儒術，有個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當董仲舒”。^⑮林彪的死黨陳伯達唯恐別人不懂其意，在一九六七年對林彪的黑話又特別加了注釋，說：“董仲舒給皇帝講道理，要想永遠統一天下，就要有一種能統一人民的思想，這種思想只能是一種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⑯十分清楚，林彪所要“罷黜”的正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林彪所要“獨尊”的，正是孔孟之道。他一面攻擊馬列主義“離我們太遠”，是“死思想”，已經“過時了”，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面，他糾集一幫黑筆杆子鑽到孔孟之道的垃圾堆里，尋找拼湊為他們搞反革命復辟的思想武器，採用什麼“歸納法，用其內容”，給孔孟之道貼上馬列

主义的标签，妄图用孔孟之道来冒充馬列主义。这是林彪“以礼治軍”的铁证。

三謂大搞“忠”字化活动。林彪也和历史上的反动儒生一样，把“三綱”做为“治軍”之本。他一面鼓吹自己是超人的‘天馬’，大搞“忠”字化活动，并授令其死党公开提出，忠于林家父子“这是头号的大事，是根本的立場，是最高的觉悟，是最純的党性”。一面又大肆散布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不能指揮的謬論，妄图夺毛主席的軍权。林彪的这一套，就是妄图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正名論，来“名正言順”地篡夺党的兵权，由他来“指揮一切”、“調动一切”。

显而易见，林彪推行“以礼治軍”的資产階級軍事路綫，是为他“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綫服务的。林彪曾經公然叫嚷要“学蔣介石”。蔣介石正是靠篡夺軍权上台的。这就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推行“以礼治軍”的資产階級軍事路綫的罪恶目的，那就是建立蔣介石式的林家父子法西斯王朝。林彪反党集团在他們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計劃《“571工程”紀要》中叫嚷“全国的武装力量，要服从統帥部的集中統一指揮，严厉鎮压一切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还說：“对过去……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这是孔孟之徒“凡兵所以存亡继絕，救乱除害”的翻版。林彪一伙所要“严厉鎮压”的，是无产階級和革命人民；他們要“解放”的，是被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綫的头子。这就是林彪“以礼治軍”的政治目的，也是林彪資产階級軍事路綫的极右实质。

毛主席教导我們：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

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今天用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儒法两种軍事思想、两条軍事路綫的斗争，就是为了更深入地批判林彪资产阶级軍事路綫，更好地理解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軍事路綫。法家主张“以法治軍”，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統一，反对割据。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法家所建立的軍隊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当人民起来反对他們所代表的剝削阶级的統治的时候，他們也是用軍隊去鎮压人民的。只有我們无产阶级的軍隊，才把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作为建軍的唯一宗旨。这是我軍同历史上一切剝削阶级軍隊的本质区别。

总结历史經驗，使我們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两条軍事路綫的斗争，是现实阶级斗争的反映。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两条軍事路綫的斗争就将长期存在下去。我們一定要认真学习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总结历史經驗，使我們始終沿着毛主席的建軍路綫前进！

〔注〕

①《礼记·仲尼燕居》

②司马光《言阶级割子》治平元年

③《图书集成·戎政典·总论》

④杨公道《曾文正公軼事》

⑤蒋介石《军人精神教育之精议（一）》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

⑥《商君书·君臣》

⑦《论语·颜渊》

⑧《韩非子·五蠹》

⑨《曹操集·遗令》《曹操集·孙子注》

⑩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天津日报》第三版

⑪同上

⑫《韩非子·亡征》

⑬《关于政治工作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

⑭《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〇年十月

⑮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的讲话

⑯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的讲话

研究法家奖励“耕战”与儒家“去兵去食”的对立批判林彪破坏人民武装反对全民皆兵的罪行

战士 郝 谦

奖励“耕战”还是反对“耕战”，是儒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认真研究儒法两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今天进行的革命斗争。

法家“耕战”思想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在西周奴隶制社会，一切土地都归最高的奴隶主——天子所有，对奴隶实行井田制，进行最残酷的剥削。到春秋时代开始使用铁制农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井田”以外的大量荒地得到开垦，成为“私田”，从而出现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代替旧的生产关系。当时战争连绵不断，就是这种生产关系大变革的表现。法家为了用新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提出了奖励“耕战”的政策，这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儒家拼命反对法家的“耕战”政策，妄图保留旧事物。所以，奖励“耕战”还是反对“耕战”的斗争，实质是革新还是保守，是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最早提出“耕战”的问题。他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①他同时还改革了军事制度，规定凡是住在一起的

人都編入同一隊伍，把居民組織和軍事組織統一起來，實行兵農合一。管仲認為，這樣做“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②由於管仲實行這一政策，使齊國國富兵強，成為霸主之國。戰國早期的法家李悝，繼承了管仲的“耕戰”思想，他在任魏國相國的時候，主張有功必賞，有過必罰，鼓勵農民積極增加產量，即所謂“盡地力之教。”^③李悝的進步主張和政策，促進了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大的國家之一。戰國時期的吳起曾和李悝一塊在魏國變法，魏文侯和李悝去世以後，吳起受到復辟勢力的排斥，遂離開魏國出任楚國。他在楚國按照李悝的思想進行變法，實行獎勵“耕戰”的政策，使楚國成為戰國前期的第二大強國。到戰國中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則從理論和實踐上對“耕戰”政策做了新的發展。《商君書》中專門有一章是《農戰》篇，從理論上對“耕戰”思想進行了比較系統地闡述和發揮。商鞅明確指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④這是對管仲、李悝、吳起等法家代表人物執行“耕戰”政策的經驗總結，也是商鞅在秦國推行革新變法路線的重要內容。他頒布了“開阡陌封疆”的法令，廢除了奴隸制的“井田制”^⑤。“開阡陌封疆”就是把作為“井田制”標記的田間道路和分界的土堆都開拓為可耕的田地，承認土地私有，可以自由買賣。規定凡是“耕織至粟帛多者”可以“復其身”^⑥。這是生產關係方面的一次根本性的大變革，它摧毀了奴隸制度的經濟基礎，奠定了地主經濟在秦國的支配地位。在軍事上，規定有軍功者按功勞大小賞給官爵，並具體規定了獎賞等級，用以鼓勵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而作戰。其中最低的两个等級“公士”和“上造”，就是為奴隸可以立功獲得解放而規定的。這就廢除了奴

隶主的“世卿世祿”制度，建立了地主階級的等級制，在客觀上也起到了解放奴隸的作用。商鞅在秦國全力推行“耕戰”政策，很快改變了秦國“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後局面，同時在軍事上也取得了很大勝利。東伐魏國，俘虜魏將公子卬（昂），使秦國一躍而成為“兵革大強，諸侯畏懼”^⑦的封建制強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一條規律：凡是實行“耕戰”政策的，國家就興盛富強。

戰國末期的法家代表人物荀況，對商鞅的“耕戰”政策給予了堅決的肯定。他曾經親自到秦國做過實地考察，認為秦國自從商鞅變法以來獲得了顯著的成就，尤其是对商鞅加強武裝力量的措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贊揚商鞅是“善用兵者”，^⑧認為秦國在軍事上的勝利是合乎社會發展要求的，并把統一中國的希望寄托在秦國的軍事勝利上。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根據當時是“爭于氣力”的時代特點，非常重視獎勵“耕戰”，認為這是富國強兵之道。他把不從事“耕戰”的儒生、高談闊論的縱橫家、游俠刺客、害怕服兵役的人、投機營利的商賈，統稱為五種蛀蟲。他認為只有發展封建地主經濟，加強軍事力量，才能通過革命戰爭統一天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進一步發展了新興地主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所以秦始皇讀了韓非的著作後，十分贊賞地說：“寡人得見此人之游，死不恨矣。”^⑨

法家“耕戰”政策的進步作用，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王朝的過程中更為明顯地表現出來。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原因，要追溯到秦孝公用商鞅進行變法使秦國由弱變強。儘管商鞅遭到了復辟勢力的殺害，但“秦法未敗也”^⑩。到秦始皇時，秦國執行這條法家路線已經經歷了六世，一百餘年，終於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

面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这就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宏图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正是在法家这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走用武装斗争统一中国的道路，才完成了“千秋帝业”，成为“千古一帝”。事实说明，不实行“耕战”政策，地主阶级既不能打天下，也不能治天下，这是一条历史的结论。所以，先秦以后的法家，尽管多次改朝换代，但都沿用了“耕战”政策。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基本上采用了秦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他推行“以有功劳者行田宅”^⑪的法令，把大量的土地和房屋奖励给有功的将吏士卒。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也都十分重视加强武装力量，实行募兵备边、屯田筑城的政策，并大力提倡民间养马，发展骑兵，加强边防力量，抗击匈奴的骚扰。三国时期的曹操，主张“强兵足食”，实行屯田制。据历史记载，他在许昌招集在战争中逃散的人民开荒种田，“得谷百万斛”（一斛等于十斗）。五年当中仓库就满了。^⑫这就保证了曹操进行的统一战争。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围绕着理财整军、富国强兵的总原则进行的。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⑬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先秦法家“耕战”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它历行百代，一直为进步的统治者所沿用。

我们回顾了法家“耕战”政策的形成、实践和发展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耕战”政策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措施，法家奖励“耕战”，其结果必然是富国强兵，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儒家的竭力反对。

在《论语》中，记载着一个子贡问政的故事。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老百姓对统治者信任。”子贡问：“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

一項呢？”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又問：“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項，在剩下的兩項中再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國家就立不住腳了。”⑭孔老二“去兵去食”存“信”的思想，其實質就是反對法家的“耕戰”政策，堅持反動的“禮治”路線。孔老二所說的“去兵”，階級性是很鮮明的。在有關孔老二的歷史記載中，沒有一處說到孔老二要去奴隸主的兵。相反，在不少地方記述着孔老二去奴隸起義和新兴地主階級之兵的言行。孔老二說：“民中飭五兵及木石者曰賊。”⑮就是說，奴隸家中修治弓、矛、斧、戈、戟之類的武器及藏有木棍石塊的都是盜賊。對奴隸起義領袖柳下跖，孔老二採取了誘說勸降的手段。當時柳下跖從卒九千，相當一個小國的兵力。他橫行天下，侵暴諸侯，所到之處，奴隸主貴族望風逃竄。為了瓦解這支奴隸起義軍，孔老二親自到柳下跖軍營去誘說，以要給柳下跖“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作誘餌，說服柳下跖“罷兵休卒”，取消革命武裝。被柳下跖臭罵一頓，丟了出來。⑯還有一個“墮三都”的故事：魯國的大夫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是新兴地主階級，三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孔老二對此極為惱火，以周禮規定卿大夫不准私自擁有武裝為借口，暗中唆使他的學生子路墮毀了叔孫氏、季孫氏的都城。只有孟孫氏的都城因為防守堅固沒有被墮毀掉。

到了戰國時期，被稱為“亞聖”的孟軻，反對“耕戰”更加起勁。他說：城牆不完善，兵甲不多，不是國家的災難；田野沒開墾，貨財不充足，不是國家的禍害。而在上位的人不用“禮治”，在下的人沒有用周禮教育，敢於造反的“賊民”起來了，國家滅亡也就快了。⑰而且他還凶神惡煞地叫嚷：善於打仗的人應該受最重的刑

罰，开垦土地、把土地分給人民的人應該受次一等的刑罰。⑱

两宋时期，司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推行的“耕战”政策，他誣蔑說：“名为爱民，实为害民；名为益国，实为伤国。”⑲到他临死时还絮絮叨叨地說，新法不去，使他死不瞑目。这就完全暴露了儒家的“去兵去食”的反动实质是什么貨色了。

历史有許多相似之处。現代的資產階級和我們党内机会主义路綫的头子，同历史上的儒家一样，也都是主张“去兵去食”的反动家伙。恩格斯在《法兰西內战》一书序言中指出：“**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資產階級統治者是这样，混进工人队伍內部的机会主义路綫的头子也是这样。我們党内机会主义路綫头子陈独秀，反对共产党掌握軍隊，要把兵权拱手交給国民党。刘少奇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結，解散了武汉工人糾察队，甚至连童子軍的木棍也在上交之列。这和孔老二的“民中飭五兵及木石者曰賊”的反革命禁令完全出于一轍。林彪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公然主张把我軍“統一”到蔣介石那里去。一九六一年，他又跟苏修一唱一合，鼓吹“和平过渡”。他拚命反对毛主席关于“**全民皆兵**”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方針，鼓吹民兵无用論，胡說“民兵搞那么多干什么”，“民兵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全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設”。⑳妄图使人們对帝、修、反丧失警惕。林彪的死党还攻击我們的战备工作是“思想挖空了，作风挖松了。”㉑所有这些，都是林彪一伙妄图破坏人民武装、麻痹人們革命斗志的罪证，也是他們尊儒反法的自供状。

必須看到，儒家竭力宣揚“去兵去食”，并非一概不要武装。他們对反革命武装是抓得很紧的，而且残酷鎮压人民，杀人最多。

列宁說：“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②②}孔老二就公开要奴隶主头子魯哀公“文事者必有武备，武事者必有文备”，^{②③}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寬猛相济”^{②④}的反革命政策。孟軻則主张大兴“王者之师”，实行“上伐下”^{②⑤}，不准士、庶民造反。林彪則学蔣介石，想把一国的兵权抓到手，他組織大小联合舰队和战斗小分队，妄图搞反革命武装政变，血洗革命人民。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們反革命的丑恶嘴脸。

从法家的奖励“耕战”与儒家的“去兵去食”的对立中使我們看到，法家的主张是进步的，儒家的主张是反动的。所以，我們对儒家应该給予彻底地批判，对法家給予历史地肯定。同时应该指出，法家由于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奖励“耕战”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加强地主阶级的专政。在无产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毛主席运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提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并为军队規定了战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在美苏“两霸”妄图瓜分世界的今天，又制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針。我們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針，彻底批判林彪破坏人民军队、反对人民战争的罪行，加强战备，能文善武，使我军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

〔注〕

①《管子·治国》

②引自一九七四年第三期《北大学报》“法家代表人物介绍”

③《汉书·食货志》

- ④《商君书·农战》
- ⑤《史记·商君列传》《汉书·食货志》《战国策·秦策三》
- ⑥《史记·商君列传》
- ⑦《战国策·秦策一》
- ⑧《荀子·议兵》
- ⑨⑩引自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北京日报》“历史上法家人物介绍”
- ⑪引自一九七四年六月《人民日报》“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介绍”
- ⑫《曹操集》
- ⑬《明史·朱升列传》
- ⑭《论语·颜渊》
- ⑮《大戴礼·千乘》
- ⑯《庄子·盗跖》
- ⑰⑱《孟子·离娄》
- ⑲引自《王安石变法》一书
- ⑳引自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九日《解放军报》第三版
- ㉑引自《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 ㉒《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 ㉓《史记·孔子世家》
- ㉔《左传·昭公二十年》
- ㉕《孟子·尽心下》